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三七期 ——  
(二〇〇八年三月十九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803f)

---

【本刊专稿】	“杨余傅事件”之初发生在空军的事	雨 音
【历史回顾】	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	王文正 沈国凡
【亲历者言】	我接六位将军出“牛棚”	刘 岩
【文革探讨】	“文革”中后期作家的分化与移位	肖 敏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

【本刊专稿】

“杨余傅事件”之初发生在空军的事

• 雨 音 •

1968年3月，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杨余傅事件”，至今已经过去38年了。多年以来，笔者曾接触过几位当年经历此事件的工作人员。听他们谈到过当初发生在空军的一些少见披露的情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杨余傅事件”初期都发生了一些什么。现整理如下，供关心和研究此事件者参考，以期真正弄清“杨余傅事件”的历史真相。

(一)

1968年3月初的一天，空军司令部门诊部护士纵素梅，找到空军党委办公室一科副科长何汝珍，向他反映说，她丈夫单士充与杨成武的女儿杨毅关系暧昧，她亲眼看到了杨毅写给单士充的情书。杨毅当时在空军报社工作，单士充时任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何汝珍一听，感到很为难，这一边是代总参谋长的女儿，一边是空军政委的秘书，他如何管得了。于是，何一边告戒纵素梅在外面不要随便乱讲，一边向空军党委办公室主任王飞作了汇报。王飞一听，也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同何汝珍、周宇驰（时任空军党办二科科长）三人一起找到吴法宪向他汇报了这一情况。吴对他们三人说，单士充是余政委的秘书，你们赶快去向余政委报告。王飞

三人就到了余立金家，当面向余报告了此事。余立金一听自己的秘书出了这样的事，并且牵扯到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的女儿，一时没了主意，还向他们三人询问怎么办好。过后，吴法宪找余立金一起商量，决定暂时把单士充隔离保护起来，尽量缩小影响面，等问题搞清楚后再作处理。当时，刘亚楼曾经住过的房子空着，只有一个公务员和空军政治部保卫部的几名干事暂住，负责打扫卫生和看管。于是，单士充就被安排在那里。就在单士充被隔离后不久，他躲过了别人的注意，偷偷与杨毅通了电话，把他们事情的暴露及他被隔离的情况告诉了杨，杨毅又告诉了她父亲。杨成武一听，大为恼火，认为空军这样整单士充，矛头是对着他的，其后台主谋就是吴法宪。因此，他把一切怨气和不满都发泄到吴法宪身上。也就是从那时起，杨成武便称病在家，基本上就再也没有去京西宾馆参加军委办事组集体办公，直到“杨余傅事件”发生。

杨成武在家并不只是养病，同时还把手伸向了空军。他通过余立金把单士充从隔离地点叫回到余立金家中秘书办公室，并发话说，没有他的命令，单士充不能离开办公室一步。

在这件事上，杨成武不仅对吴法宪产生了成见和不满，而且把他们家所遭受的一切磨难，都记到吴法宪的头上。多年以后，杨成武当上了福州军区司令员。他到位后不久，便立即派福州军区两名干部找到何汝珍，要他交代是如何秉承吴法宪的旨意，将杨毅迫害致死的。何汝珍向两位来者从头到尾详细地谈了事情的起因经过。并告诉他们，“杨余傅事件”发生以后，中央决定将杨成武安排到河南洛阳，杨毅还在空军，他曾参与负责管理。由于杨毅的身体不好，后经请示中央同意，便把杨毅送到了她父母的身边，从此，杨毅便不再由空军管理。杨毅到她父母身边后，曾给何汝珍写去一封言辞十分恳切的信，对何汝珍给予过她的帮助、教育和照顾，表示由衷的感谢。并说，她把在空军的情况都向她父母说了，他们听后都表示，在这件事上对空军有了误会。福州军区的两名干部，听了何汝珍谈的情况，并看了何汝珍就这一事件给中央专案组写过的材料的底稿，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原委才恍然大悟，一笑了之。

## （二）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给总政治部写信反映说，余立金在新四军工作期间在皖南事变中曾被俘叛变。信件由总政转到空军。要求空军调查落实。时任空军司令员、空军党委第一书记的吴法宪见信后，立即派何汝珍和空五军一位副军长前去调查。他们二人找了当时所有能找到的一些相关人员，调查结果并不能证明余立金有被俘叛变的问题。何汝珍回京向吴法宪汇报以后，空军如实将调查情况向总政治部作了汇报。

不知是什么原因，自从余立金的秘书向余报告说，何汝珍最近不在家里，不知道被派出去干什么去了之后，余的心里就非常敏感，极力想搞清楚。先是由他的秘书通过查看何汝珍回京后的报销单据，了解何都到了哪些地方。然后，余立金亲自当面向吴法宪询问，何汝珍干什么去了。吴法宪就把总政转来的关于他的历史问题的群众来信，要求空军调查的事告诉了余立金，并说何汝珍已经调查清楚了，你没有问题，要他放心。但是余立金对吴法宪派人调查他的历史问题，一直耿耿于怀，心存不满，认为吴法宪在背后整他。在这一点上，他和杨成武有着共同的心态。所以，当杨成武要余立金把单士充从隔离地点放回到他家时，余立金完全不考虑他与吴法宪曾共同商量的决定，甚至不顾及他自己的秘书同杨成武的女儿有不正当关系造成很坏影响的事实，毫不犹豫地照杨成武的话办了。

单士充被杨成武、余立金从隔离地点放走的事，是背着吴法宪干的。吴法宪知道以后，于一天晚上，派空军党办一科科长卫球和秘书蔡秉霖，到余立金家叫单士充去谈话。卫、蔡见到单士充后对他说，吴司令要你去一下。单士充自恃有杨成武和余立金撑腰，拒绝去见吴法宪，并说“杨代总长有指示，没有他的命令，我不能离开办公室一步。”在这种情况下，卫、蔡只好说：“既然吴司令叫你，你不去，那你就把为什么不去的原因写一下吧。”单士充当即提笔，在

一张纸上将他前边说过的话写了一遍，交给了卫、蔡。

当晚11点前后，余立金突然带着单士充来到吴法宪家。当时值班秘书张云龙见状，急忙迎了上去。余立金一边问吴司令睡了没有，一边就直接上楼向吴的办公室走去。张云龙一边回答还没有睡，一边跑上去向吴报告说，余政委来了。吴法宪当时正在打电话，就说先请余政委到楼下会客室等一下。不一会，吴法宪从楼上下来。吴刚一进会客室门，余立金就说：“吴司令，今天你叫单士充来，他不来，这是他的不对，我批评了他，要他来向你检讨。单士充马上站起来说：“吴司令，今天是我的不对，我向你承认错误，请首长批评。”吴法宪非常不满地对余立金说：“把单士充暂时保护起来，是为了维护杨代总长，这是咱们俩商量定的。可什么时候叫单士充回去的。我根本不知道。连给我说一声也没有。今天晚上，我派人去叫单士充来谈话，单士充竟然不来，还说是杨代总长不让他离开。难道我一个空军司令员、空军党委书记，连找一个空军干部谈话的权利都没有？还要经过谁的批准才行？”余立金一再说，这是单士充的不对，是单的错。单士充则一个劲的承认错误，请求批评处理。在当时的这种气氛下，谁也没有更多的话可说，很快，余立金就带着单士充走了。

以上就是1968年3月上中旬，发生在空军的与“杨余傅事件”密切相关的事。不知为什么，后来竟发展演变成重大的政治事件，要揭开其中的谜底，人们期待着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几次解决杨余傅问题的会议档案，早日公布于众。

~~~~~

## 【历史回顾】

### 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

• 王文正·沈国凡 •

改革开放初期，我有幸参加了两场共和国大审判。1980年，我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参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981年初，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宣判后，我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回到上海休息几天，到医院里看望生病多时的老伴，然后于3月到衡山饭店报到，作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参与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我在2006年出版的《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这本书中，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过程已经作了一个全面的口述；而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情况，至今却鲜为人知。作为一名亲自参与了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全过程的法官，觉得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情况进行一次回忆，那就先从庭审的情况说起吧。

#### ◇ 提起公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四人帮”上海余党所犯下的罪行，早已引起了上海人民以及全国人民的愤怒，纷纷要求清算他们的罪行，将他们与其主子“四人帮”一同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在这个时候，中共上海市委顺应民心，并报请中央批准，决定对这伙作恶多端的余党进行公审，以平民愤。1980年12月，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还没有结束，上海方面就开始着手准备对“四人帮”上海余党的审判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余党中的骨干分子当时列出的一共有40多名，而首次决定进行法庭审判的共9名。他们是：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女）；原上海市革委会常务委员、工交组负责人陈阿大；原上海市革委会常务委员、市总工会副主任叶昌明；原上海市革委会常务委员、财贸组负责人黄金海；原中共上海后方基地委员会副书记戴立清；原中共上海市轻工业局委员会副书记

马振龙；原上海市革委会常务委员、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

可是，当年我们审判后的判决书，为什么只有8个人，而独独少了一个位于这伙余党之首，而又罪大恶极的“三结合老干部”马天水呢？马天水在这伙余党中，是一个在上海为“四人帮”当掌柜的角色，不审判他人民群众自然不能答应。但法律是严肃公正的，对任何人都应该是一视同仁的，我们不能因为对这伙人的仇恨而做出违背法律的事情来，不经过法庭审判而将一些罪名定在他们的头上，那样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马天水正是属于这样的一种情况。

我曾听有人说马天水是因为他的老战友在中央某某部门工作，给上海打了招呼才没有受审的。这全是谣传，哪能有这样的事情！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声讨“四人帮”及其余党的罪行，即使马天水有这样的“老战友”，别说是对他们一伙人的做法早已愤恨，就是想出来说话，恐怕也没有这个胆子，就是说了，我们法庭也不会听他的！

那么，马天水究竟是什么原因没有受到法庭审判呢？

据我所知，“四人帮”被粉碎第二天，马天水就被中央通知去北京“开会”。他到北京期间，中央派人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达给他。他听到后立刻脸上显出一种异样的表情，双目发呆，站在那里久久不动，然后便发出一声令人不解的怪叫声，可见这件事情已将他的精神世界完全击垮。后来他还向中央提出，要求对“四人帮”宽大处理。在关押期间，由于各种原因，马天水患了反应性精神病，经常会独自一人发呆，有时傻笑，完全丧失了供述、申辩能力。我曾听有的人说，这是马天水见自己末日来临，在监狱里装出来的，目的就是逃避法庭对他的审判。当然，各种说法都很多，这么多年过去了，到现在都还有人在这样问我，这不奇怪，因为没有对马天水进行审判，人们总觉得这场审判有些不够完美。人民群众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们一切都得按法律办事，马天水究竟有没有精神病，这不是谁说了能算数的，也不是他装得出来的，这得经过严格的科学检查。

为此，我们请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对其进行了多次检验，结论是情况属实。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于因精神病而失去了供述和申辩能力的被告人，法庭不应对其进行审判。后来我们按照法律规定，给市委如实打了报告，市委批准只在《起诉书》中揭露其罪行，暂缓对其进行起诉和审判。

1982年6月26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对徐景贤、王秀珍向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7月2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对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朱永嘉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有意思的是这些被告由于各自对法律的认识不同，对于让他们委托律师的事，却有着不同的表现。现在看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当时却不是这样。由于这些人是“四人帮”的骨干分子，他们的思想受“四人帮”的影响十分严重，对于法制的认识更是可怜。他们过去习惯于以权代法，现在要对他们审判，他们认为我们还可能采用他们那一套，因此对请律师根本就没有当一回事。经过法院再三地做工作，向他们讲明现在全国上下正在将他们过去的一套彻底抛弃，实行依法治国。他们虽然犯了罪，但在法庭上同样有委托律师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在这些人中，只有王秀珍是主动要求要律师的，因为她曾在特别法庭上出庭作证，知道姚文元和陈伯达的律师是如何地为他们辩护的。通过我们对于法律的讲解，后来有6名被告委托了律师，戴立清和马振龙没有委托。

这样，中级人民法院不得不派人再找他们谈话。戴立清坐在那里，面无表情，情绪显得很低沉。他听了后抬起头来，看了看法官，有些不相信地问：“在你们的法庭上真能请人辩护呀？”

谈话的法官说：“你怎么不相信法律。”戴立清不由重复了一句：“法律……”最后，戴立清同意法院为他请了指定的辩护人。中级法院的法官找到马振龙，他对法官的说法表示不信任，便一口回绝，不愿委托律师。后来法官提出，由中级人民法院为他指定一名律师，他仍是瞪着眼睛，对去问他的人说：“我不要。”

这些人经过长时间的预审，大多数都已认识到自己对国家和人民犯下的罪行，表示愿意接受国家法律的审判，但仍然有少数人对此表示不满，认为对他们的审判有些“过了头”，在预审时常跟审讯的人员顶牛。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对这场审判必须得认真严肃地对待，切不可掉以轻心。

为了反映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意愿，在审判之前，从全市的工业、财贸、科技、文教、工人、妇女和民主党派中选出了20名人民陪审员，与市高、中级人民法院的12名审判员一起，共同组成了8个合议庭。

1982年7月13日，庄严神圣的审判开始了！

#### ◇ 法庭对质

由于审判是由高院和中院两家同时进行的，因此面比较广，我这里选最主要的几个审判情况讲一下。

第一个被审判的是徐景贤。1982年7月13日，徐景贤被带上法庭。49岁的徐景贤留着分头，头发有些零乱，一直搭在眼眉上。他再没有了昔日担任市委书记时的派头，面容显得有些忧郁，头向下低着。由于这次不能对马天水进行审判，因此徐景贤就被推到了这伙余党的首犯位置，看得出来他显得有些紧张。

检察院提起公诉，指控徐景贤犯有“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积极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组织策划者，罪行十分严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适用法律的规定，徐景贤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

徐景贤是这些被告中很有心计的一个。在预审的时候，他对于一些次要的罪行都承认得很快，而对于一些主要的罪行却不断地找各种理由来回避。用我们法官的话来说，就是认罪不够稳定。徐景贤的罪行最严重的一条就是策动武装叛乱。在预审的时候，他对于主要的事实都做了交代——不交代也不行，因为别人都已交待了。但从他的讲话中，不时流露出一些情绪，那就是这样做是被迫的，是在当时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为了避免被“一网打尽”而采取的被动的防御措施。同时他还一再强调，武装叛乱未遂。在法庭上，面对法官的提问，他还是强调说，他自己“对策动武装叛乱在1976年10月10日到北京时，个人的行动就已经终止了：而且在10月12日书面向中央领导人作了‘自首’报告”。

说完之后，徐景贤抬起头，看了看台上的法官。法官对他后面所说的向中央领导人“自首”没有提出疑义，但对于他以此否定策动武装叛乱的说法当场宣读了几名当事人证词，并当庭出示了物证。他一听这些证词都是他们一伙当事人所说，知道没有办法推掉，再看那些投影的物证，也都无法赖掉，便承认“是事实”。

可是，当问到迫害陈丕显、曹荻秋等人时，他却不愿承认。听到这里，审判长张增祥看看徐景贤，问道：“被告徐景贤，我问你，这件事情你到底有没有关系？”徐景贤见张增祥追问

得紧，仍然将事情推到客观的原因上。徐景贤说，自己曾经对陈、曹二人进行过诬蔑，也是想将他们打倒，但自己对诬陷材料的来源不清楚，这些材料都是由专案组汇报和提供的，自己没有多大责任。张增祥曾经同我一起，在北京秦城监狱参加过对“四人帮”的预审，因此对于很多情况都掌握得很准确，对于这些被告的心理活动也掌握得很透彻。他知道到了此时，这些人还是不肯轻易认罪，必须得摆出事实，让他们在事实面前低头认罪。张增祥问道：“你当时是市委主要负责人之一，专案组的材料怎么能不知道，你必须得说出道理来。”徐景贤是个很有心计的人，听了法官的话之后，他不紧不慢地回答说：“专案组不是我在管，而是由王少庸、王承龙他们在负责。”这明明是在表面上承认，而事实上又否认掉了。

一个新的问题提到了法庭面前，徐景贤真的没有管过专案组的事情吗？公诉人向法庭提出让当事人出庭作证。张增祥同意公诉人意见，宣布让当事人出庭作证。随后，一个人在法警的陪同下，走到了法庭前面。徐景贤不由偏过头去看了看，脸上露出有些惊愕的样子。这个出庭作证的证人名叫盛龙涛，是原市革委会专案办公室曹获秋专案组的副组长。徐景贤一看是一个熟人，不知道这个人要说些什么，脸上的表情有些难看。

盛龙涛说，徐景贤等人在夺取了上海市党政领导大权之后，处心积虑欲置陈丕显、曹获秋于死地。他们在全市多次组织批斗大会，要陈、曹二人低头认罪，如不认罪，就实行体罚，有时还动手进行毒打，使二人的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曹获秋最后被迫害而死。

法庭为此追问徐景贤：“证人讲的是不是事实？”徐答：“基本上是事实。”这就是徐景贤与其他几名被告不同的地方，加之他的职务，他的案子就比其他几位要复杂一些。在法庭上，他同特别法庭审判的姚文元一样，在文字上比较注意分寸。而王秀珍等几名被告，在法庭上就没有这种现象，认罪态度好的，是自己犯下的罪行都承认，认罪态度不好的，干脆就顶牛，没有或很少用过这样的词句。法律不承认“基本”，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能有一点含糊。公诉人这时向证人发问：“曹获秋为自己的问题，曾向中央写过申诉信，这些申诉信后来都到哪里去了？”证人答：“这些信后来都被扣压了。”公诉人：“那么，你们是如何将曹获秋定为叛徒的？有没有根据？”证人：“那是在王洪文、徐景贤等人的高压下，由我们专案组写出来，然后报给当时的市委和市革委的。”公诉人：“请你讲具体事实。”证人这时看了看站在那里的徐景贤。徐景贤站在那里，头微微地抬着，头发挂在眼睫毛上，看得出他听得还是很认真的。证人接着说：“专案组经过几年调查，认为曹获秋没有根据定为叛徒。因此在1972年7月17日写了一份‘曹获秋被捕后，在监狱里编了假口供，没有暴露身份，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出卖组织，定叛徒没有确凿根据’的情况，登在一份《情况反映》上。”这时，公诉人要求法庭出示这份《情况反映》。法庭当众出示了这份材料。完后，法警走上前来，将这份《情况反映》拿到徐景贤的面前，让他进行辨认。徐景贤看了看，承认“确有此事”。

公诉人要证人继续发言。证人说：“王洪文、徐景贤看到简报后，大为不满。王洪文说：‘按你们的观点，曹获秋可解放了，可当市委书记了，张春桥不是要下台了吗？’徐景贤说：‘三个（指诬陷曹获秋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整理者注）没有写得很突出，有问题。应该写成曹获秋被敌人逮捕后，暴露了身份，出卖了同志，出卖了组织。’王秀珍说：‘他不是叛徒，还有谁是叛徒。’他们强令专案组按照他们的调子，重新起草报告。”证人说完之后，审判员问徐景贤：“证人讲的是不是事实？”徐景贤见人证物证都在面前摆着，再也无法推脱了，只好承认“是事实”。

徐景贤接着说：“法庭上所指控的我的犯罪事实都是客观存在，是符合事实的，在事实面前我认罪服法。那份诬陷曹获秋的所谓审查报告，完全是在我们威逼下写出来的。”

在庄严的法庭上，徐景贤说话的声音有些发颤，相信整个旁听席上的人都听到了。

## ◇ 王秀珍服法认罪

朱永嘉、陈阿大、叶昌明等人在经过预审之后，在法庭上对自己的所犯罪行也都能认识。

这里面服法较好的还是王秀珍。虽然同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但王秀珍与徐景贤不同。徐景贤一开始就在市委机关，在上层活动，后来手中掌握着大权，了解上层情况。他伙同王承龙诬陷迫害魏文伯，这个要算在徐景贤的头上，但不能认定王秀珍参与了对魏的迫害。至于郑平、刘慎之等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被迫害致死，那就更不能算在王秀珍的头上，这就是实事求是。我们不能因为她后来掌了大权，就笼而统之地都将她和徐景贤算在一起承担罪责。从这一点上，王秀珍感受到我们办案的实事求是。作为“四人帮”在上海的主要骨干分子，又是一个女性，王秀珍肯定有着与其他人不同的地方。

7月14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王秀珍进行审判，我是负责王秀珍一案的法庭审判长。她被带到法庭的被告席上。这个47岁的女人长着一张圆脸，梳着齐耳的短发。她站在那里，抬起头来看看审判台上的法官，显得有些紧张。公诉人发言之后，我问她：“王秀珍，公诉人的发言你听见了吗？”王秀珍答：“听见了。”我问道：“被告王秀珍，法庭问你，你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了哪些人？”王秀珍想了想，接着就说了一大串受到她迫害的人的名字。这些名字不但多，而且牵涉到全市各个部门、各条战线，听得台下旁听的人一个个都惊得睁大了眼睛。一开始，王秀珍对这些受到过她迫害的人名字都很熟，说得也很快。可是说着说着她就放慢了速度，一边想一边说，最后竟停了下来，对法庭说：“还有许多名字，我都叫不起了，也想不起来了。”我追问道：“你自己做的事情为什么想不起来？”王秀珍脸上显出一种痛苦的表情说：“受到我迫害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真的无法记起来了。”旁听席上立刻发出一片惊叹声。那个时代这些人简直就像疯了一样地迫害别人，听到下面的惊叹声，王秀珍显得有些紧张，她向自己的左右看了看，又将头低了下去。

我在法庭上对王秀珍为什么要如此疯狂地迫害他人的动机和目的进行了追问。我问她：“你为什么如此无缘无故地迫害别人？”王秀珍答：“不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以及他们在上面和手下的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我们这些人是上不去的。”由此可以看出来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以迫害别人来为个人谋取权力和私利。正是出于这样一个目的，被告人王秀珍在1968年伙同徐景贤在全市电视大会等会议上，诬陷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上海市市长曹荻秋是“反革命分子”，并对他们进行人身迫害，非法监禁。1972年至1973年，王秀珍伙同马天水、徐景贤等，再次诬陷陈丕显是“反革命”、曹荻秋是“叛徒”，致使陈丕显长期遭受迫害，曹荻秋被长期折磨致死。光是这样还不够，王秀珍还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在1976年2月至4月，在张春桥、王洪文指使下，先后在全市万人大会等会议上，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是“组织还乡团”，搞“反攻倒算”，并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是“还乡团团团长”、“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

在庭审王秀珍的时候，我还问了武装叛乱的事情。1973年至1976年，王秀珍按照王洪文的指使，利用窃取的组织大权，先后指派周宏宝、施尚英、印玉泉等为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控制民兵武装的领导权。1976年10月8日，徐景贤、王秀珍获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的消息后，决定发动武装叛乱，由徐景贤、王秀珍负责总指挥……由于中央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和上海军民的坚决斗争，才使他们的武装叛乱未能得逞。法庭对于这些，不但追忆问了王秀珍本人，同时还当庭出示了相关的物证和投影，当庭宣读了证人的证词。关键的地方还让证人出庭作证。在事实面前，王秀珍对于这些都供认不讳。

在开始审判王秀珍时，法庭还有一个担心的事情，就是她曾多次与当时军队方面的一些领

导同志有过来往，也曾请他们在某些方面给以帮助和支持。还有一些事情，直接地牵涉到当时中央的领导人，如果在法庭上说出这些人的名字来，势必会给审判带来影响。当然，法庭尊重的是事实，如果她硬要在法庭上讲，那也没有关系，我们也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

王秀珍的审判顺利就顺利在她这个时候的态度比较好，只要是自己的事情，都没有想法去推脱，而是实事求是地承认了。凡是未曾问到的，有关中央领导人和军队方面的事情，她都只字未提。为什么王秀珍在法庭上会有这么好的态度呢？这主要是我们在执法的时候，一是严格依法办事，二是实行了人性化的执法。这是在“四人帮”时期从来未曾有过的。一开始，王秀珍认为这一下自己完了。所有的坏事都得算在自己头上，因此她的情绪很低落。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之前，王秀珍曾作为证人被“请”到了北京，关入秦城监狱。她不知道要自己来北京干什么，从外表看心情有些紧张。开庭前，在秦城监狱三楼一个房间，我和另一位王洪文预审组的预审员找她谈话，向她了解有关上海武装叛乱的事情。王秀珍被带进来了。她站在那里，用一双有些惊讶的目光看着这个屋子。里面没有审讯犯人的那种简陋的木桌和木凳，墙上也没有张贴那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屋子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只水杯，旁边靠窗的一张小桌上放了一只水瓶，几张沙发摆在屋子里。屋子的窗户敞开着，清新的风不停地从外面吹进来。走出囚室的王秀珍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我用手指着旁边的那张单人沙发，让她坐下。她不敢坐，仍然站着，用一种怀疑的目光看着我。她有些不相信。因为在他们统治的那个时代，一个被确认为罪犯的人，难道还用得着这样来进行谈话吗？等她坐下来之后，我给她倒上一杯开水，送到她的面前。她看着水杯，没有接，最后也没有喝，用一种不解的目光看着我，看得出来她内心深处所受到的触动。等她坐下之后，我就平心静气地与她讲关于参与上海武装叛乱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前，王秀珍只是上海第三十棉纺厂的一名技术员。工作表现也还是可以的。那时别说是武装叛乱，就是枪也很少摸过，后来她之所以敢于参加并策划武装叛乱，与她日渐膨胀起来的个人私欲是分不开的。当时特别法庭正准备开庭，在王洪文、张春桥的罪行中有一条重要的罪状，那就是策动上海武装叛乱。但这件事情到了法庭上，还是得要有人证物证的。物证当时已经收集很多了，但人证呢？只有让参与策划的徐景贤、王秀珍、施尚英等人说出事件真相，并在法庭上当庭给以揭发，才能让王洪文、张春桥低头认罪。王秀珍愿不愿与她昔日的顶头上司们当庭对质呢？这正是我们所担心的问题，于是预审组让我这个来自上海的法官找她谈话。我向她说明了找她谈话的原因，希望她能认识自己的问题，把握住这次认罪的机会。王秀珍坐在单人沙发上，听完之后没有说话，而是陷入了沉思。看得出来，此时王秀珍的思想斗争是很激烈的。我对她说，我这次与你纯粹是一次谈话，不是审讯。你自己考虑一下，愿意不愿意都由你自己决定。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刚才还沉默无语的王秀珍听了这句话之后，马上表示这是给自己一个认罪的机会，愿意与王洪文、张春桥当庭对质，揭发有关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的犯罪事实。

1980年12月13日上午，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庭审王洪文时，王秀珍出庭作证，她就武装叛乱的前后经过，讲了近半个小时，逼得王洪文当场低头认罪。

对于这场上海“二王”在特别法庭上的对质，中央电视台当晚进行了全场播放，这是特别法庭上出庭作证的唯一的一次全场播放。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特别法庭上的对质，也是给王秀珍上了一堂法制教育课，使她真实地看到了人民法院尊重事实、依法办案的原则，因此以后的上海大审判中她才能更彻底地认识自己的罪行。

除了以上的原因之外，还有就是我们没有学习他们过去搞的那一套，而是对罪犯实行了人道主义，使她真正地受到了感动。王秀珍患有高血压和妇科病，在监狱中有关方面从生活上给予了必要的关照，她曾一再地表示感谢。



王秀珍有两个女儿，在她被拘捕的这几年里，正好是学校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孩子们心里有些悲观，认为有这样一位母亲，到哪里也不会有人要。作为一名罪犯和母亲，王秀珍在狱中一边要反省自己的罪行，一边随时关心着女儿的前途。她此时的情绪表现出来有些低落。就在这个时候，监狱方面将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告诉了她，她的一个女儿在招工时被一家全民所有制单位接受了，另一个女儿也考取了技校。这样的前途，是当时的年轻人所羡慕的。听到这个消息，王秀珍一下子惊呆了，女儿没有因为自己的案情受到牵连，这在她来说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回想在“四人帮”统治的岁月里，作为上海滩上掌权者的自己，能有这样的举动吗？能为“罪犯”的孩子们做出这样的事情吗？

#### ◇ 仍然有顽抗到底的人

马振龙在这几名“四人帮”余党中当时职务并不是很高，但他最后却比别的与他职务相同或者是还要高的一些人多判了一年，这是为什么？这就是我所说到的根据审判时的态度了。

马振龙原是上海搪瓷厂的一名工人，乘着“文化大革命”的“东风”当上了上海市轻工业局党委副书记、市总工会常务委员。这个人对于到手的权力很怀念，对于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显露出很强烈的抵触情绪。在进行预审的时候，他态度蛮横，根本不听预审人员的提问，经常是吵吵闹闹，搞得对他的预审很困难。在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对他提问时，他竟然拒不回答，问急了就公开与检察官顶牛。更令人不可容忍的是，他竟然还当面诽谤预审人员和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他在预审时还威胁说，到了法庭上他不但承认自己有罪，同时还将大闹法庭，气焰可说是十分嚣张。他没有江青的“本钱”，但他的思想受到江青等一伙人的影响却不可低估，最后在法庭上还是采取了对抗的态度。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马振龙一案开庭审判时，马振龙被带到被告席上，将头硬挺着向上抬着，但却不看法庭上的审判法官，而是有意地转向一边，一派目空一切的样子。我曾从事过近30年的司法工作，这样的罪犯我也见过，这样的罪犯实际上他的心理是最空虚的，法庭必须得用事实让这样的罪犯低头认罪。

马振龙最主要的一条罪行就是参与上海武装叛乱。法官根据起诉书指控：“1976年10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后，徐景贤、王秀珍决定发动武装叛乱。10月8日晚。被告人马振龙积极参与王秀珍策划的武装叛乱活动，共谋设立秘密指挥点、扣留轻工业局为部队生产的枪支弹药供武装叛乱使用。”法官问他：“被告马振龙，起诉书指控的是不是事实？”马振龙竟将头一扬，大声地说：“不知道这件事情。”问：“你自己做的事情怎么能不知道？”答：“我没做过。”问：“你得说出道理来。”答：“没有做还要什么道理？”面对马振龙如此嚣张的气焰，法庭当场宣读了证人的证词，这些证词，大都是一些当时当地的这件事情的直接参加者，更有指挥他干这件事情的直接“领导”。马振龙没有想到，他的那些“顶头上司”都已经“缴械投降”了，并且还反过来揭发自己，不由身子微微一震，没有再说话。

为了让马振龙这样的顽固分子认清自己的罪行，法庭除宣读相关证词外，还请当事人出庭作证。每一个证人出来时，马振龙都用眼睛扫了对方一眼，然后又装着无所谓的样子将头转了过去。我想他一定思想斗争很激烈，因为这些都是他过去造反时的“铁哥们”。现在反戈一击，在法庭上与他来面对面地对证了，这使他既感到气愤，同时又感到了害怕——他怕的不是这些人，而是他将面对的事实。这些证人的话，如同一发发炮弹向马振龙射过来，我看到他的头再也没有刚开始时那么硬挺着了，不知何时竟微微地低了下去。法官问他，以上证人讲的是不是事实。马振龙答：“基本是事实。”

除了武装叛乱之外，马振龙另一条就是他曾在1976年二三月间，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新的动乱，诬陷邓小平是“复辟势力的总代表”、“还乡团的总团长”，图谋最终颠覆政府。

这次被审判的8个人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主要依靠的骨干，办事都在一起商量的，也是在一起做的，因此他们的犯罪事实大部分都是相同的。他们共同研究，共同实施，牵出一个，就会拉出一串，像马振龙这样想硬“抗”也是无法抗住的。上述罪行，有证人证言和查获的书证、物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在庭审中，被告马振龙供认了部分事实，但态度顽固，拒不认罪。

其实，马振龙的罪行比起其他几名罪犯要小一些。最后法庭确认的不就是武装叛乱和诬陷邓小平这么两条吗？但他这个人受“四人帮”的毒太深了，一时很难自拔，总认为我们法庭审判只不过是走形式，最后会像他们掌权时一样将国家的法律扔在一旁，用他们对待人民群众的办法来对待他们。在这种阴影的笼罩下，他怎么能认识自己的罪行呢？

可是，还有更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在后头呢！经过合议庭，法庭宣判之后，法官到看守所将判决书送达时，他开始不肯接，后来接过去了，连看也不看，一扬手就扔到了铁窗外。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奇怪，在上诉的十天期限内，这个庭审时态度最顽固的马振龙却并没有提出上诉。这真让人有点意想不到。这能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法庭是按法律办事的，对他的案子是实事求是的，我想马振龙自己心里是明白的，这表示他最后服从法庭的判决。这就是法治的力量，就是依法办案的力量啊！

□ 《百年潮》 2008年第1期

~~~~~

#### 【亲历者言】

#### 我接六位将军出“牛棚”

• 刘 岩 •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出版发行的《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一书，第二十三节中记述了李德生遵照毛泽东和周恩来关于解放老干部的指示精神，抓紧“做好解放175位将军的工作”。其中写道：“原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中将、（第二）政治委员李成芳中将，是红四方面军的团长、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都在晋冀鲁豫军区担任过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是刘邓大军的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军长。解放后，贺龙元帅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与这两位军长是上下级关系。‘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被诬陷为‘贺龙分子’关押起来，总政治部连个关押地点都不知道。几经周折，才弄清他们被关押在湖南境内广州军区一个军队农场。李德生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先后将秦基伟、李成芳和昆明军区副政委胡荣贵少将、副政治委员张子明少将，南京军区原参谋长王蕴瑞少将等接回北京，休息治疗，等待安排工作，并将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去湖南接秦基伟、李成芳等“回北京休息治疗，等待安排工作”的任务，是李德生派我和总政组织部的秘书任振先具体执行的。有人戏称我俩这次执行的任务是接干部出“牛棚”。在完成这一工作任务的中间，颇有一些值得回顾的故事，现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 ◇ 李德生在京西宾馆面授任务

我于1968年冬由济南军区政治部借调到军委办事组干部部工作。1969年7月，李德生由南京军区调军委办事组后，就京西宾馆住宿和办公，我和他经常见面，但工作上没有直接接触。1969年12月，总政恢复办公后，搬到旃坛寺总政大楼办公。李德生开始是以

总政临时党委书记的身份主持工作，半年后被任命为主任。这样一来，我就同他断不了在小型会议上或呈送、领取文件等工作中有所接触。1972年国庆节后的一天早晨，总政干部部领导通知我，带上洗漱用具、粮票、出差费，早饭后接上总政组织部的任秘书一起去京西宾馆找李德生主任受领任务。

我俩到宾馆九层西头套间见到李德生后，他开门见山交代任务说：“你们马上出发到湖南省军区了解一下秦基伟、李成芳、胡荣贵、张子明、王蕴瑞、张力雄六个人的情况。”他还特意交代：“见到秦基伟后，问一问他当时是怎么被留在北京，没有回到昆明军区去的。”

我当时在总政干部部第二任免处（后改称第二任免局）任副处长，该处负责各大军区正师职以上干部的任免工作。这六位将军“靠边站”前都属该处业务管辖范围，老的花名册上都有他们的名字，所以李德生一讲他们的姓名，我都知道他们原来的任职情况。秦基伟是昆明军区司令员，李成芳是昆明军区第二政委，胡荣贵、张子明是昆明军区副政委，王蕴瑞是南京军区参谋长，张力雄是云南省军区第二政委。“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先后“靠边站”，有的归中央第一专案办公室审查，有的归别的专案组审查。审查情况专案组从来不与总政干部部通气，总政干部部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准过问专案审查对象的情况。因此，我想请李主任明确一下这六位将军的矛盾性质，便说：“主任，我们见到他们时，怎么说明来意？”李德生回答说：“一是代表组织看望他们，二是听取他们的意见。”听到这两条，我心里就有底了：至多是人民内部矛盾。

◇ “总政来的这位处长举动可不一般！”

我和任振先从京西宾馆直奔首都机场。那时客运航班很少，事先又没有订购机票，只能是遇到哪趟航班就乘坐哪趟航班。到机场不久，有一架从沈阳飞广州的里—2型小飞机，十几个座位的座舱内只有我和任振先两个乘客，在开封、武昌两次落地后于下午到达长沙。湖南省军区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和干部处处长到机场把我俩接到接待所，问工作怎么安排。我说，我们这次来湖南的任务是专程看望秦基伟、李成芳等六名干部。干部处处长说，他们现在都住在宁乡县的灰汤疗养院。我说，那就请省军区安排一辆车，明天早饭后出发去灰汤。

秦基伟等六位将军是1969年“紧急战备”时被疏散到湖南的，开始安排在洞庭湖畔汉寿县的一个部队农场劳动，“九一三”事件后，于1972年4月转到坐落在宁乡县灰汤镇附近的解放军364医院（又称“灰汤疗养院”）休息。他们的日常生活由湖南省军区管理，但是这六位将军为什么被“靠边站”，到底有什么问题，谁也没有向省军区作过交代，省军区的同志也不便过问。中间除了时不时有专案组人员找某个人谈话、调查核对材料以外，他们与原单位完全断绝了组织联系。

灰汤疗养院坐落在素有“潇湘第一泉”之称的灰汤温泉附近，山清水秀，环境幽静，温泉水温高达90摄氏度左右，确实是个疗养的好地方。六位将军从农场转到这里，处境有了很大改观：一是解除了劳动；二是家属可以前来探望团聚；三是可以到食堂吃饭，也可以自己起火；四是归口管理的机关不是原来的保卫部门，而是换成了干部管理部门。

然而，对他们的处理还是留了个“尾巴”。他们虽然住在了疗养病房，但并没有真正享受到正常“疗养员”的待遇，日夜24小时陪伴他们的不是医生、护士，而是保卫干部和警卫战士。他们住的病房，是在一座二层楼的楼上，房子窗户朝南，房门向北，病房门外有一个敞开式的长廊相连，长廊两头各有一个楼梯。六位将军和他们的夫人住在中间，两头靠楼梯的房间里住着负责他们安全的干部和战士。他们外出活动，要向警卫人员请假，活动范围只能在疗养院附近。管理他们的省军区政治部干部处，有事都是通过照管他们的警卫人员转达，从来不与他们

直接接触。干部处处长为六个人的事免不了去疗养院收发文件、部署工作，但与他们“保持距离”却一直没有改变。因此，我见到这六位将军时的一些举动，使他感到“不一般”。

省军区干部处处长陪同我俩到达疗养院，我们把随身所带的日常用具放在招待所就去病房探望。先是一户一户地拜见，见了面我首先向对方敬礼，问候“秦司令好”、“李政委好”，然后说：“我叫刘岩，是总政干部部第二任免处副处长。他叫任振先，是总政组织部秘书。我俩受总政治部李德生主任的委托来看望首长，一会儿集中一块再汇报来意。”六户走访完毕，大家先后来到学习室坐定。我说：“李德生主任派我俩专程来的任务，一是代表组织看望六位首长，二是听取首长们的意见。听取意见的方式准备一户一户个别交谈，我俩由东向西，到首长房间一位一位地谈，时间不限，请你们把要说的话说完为止。有的事一次没谈完，想起来可以第二次、第三次谈，我们什么时候听完首长们的意见，什么时候再离开疗养院回北京。”

散会后，接着到房间个别交谈。此时，我示意省军区干部处处长不必再陪伴了。他回到招待所给省军区领导打电话，汇报我们会见六位将军时的情况。后来听说，他打电话的第一句话是：“总政来的这位处长举动可不一般！”所谓“不一般”，是与过去来疗养院的专案人员的举动对比而言的。专案人员见到他们一不敬礼，二不握手，三不称呼职务，四是叫名字时不加“同志”二字，有的甚至还加以训斥、指责。

我俩用两天的时间，听取了六位将军的意见后返回北京。一到办公室，干部部的领导同志就交给我一份广州军区政治部发给总政治部的电报，内容是关于改善秦基伟等六位将军生活状况的几条措施，请示总政治部是否同意。措施有五六项，其中包括：一是把六位将军接到长沙大医院，全面检查一次身体；二是由广州军区卫生部调拨一批六位将军需要的药品，放在疗养院药房专药专用；三是给疗养院增配一辆小汽车，专门用以到宁乡县城等距疗养院较远的市场采购副食品；四是组织六位将军和他们的夫人，到韶山毛主席故居参观游览。另外，还有关于看文件、日常生活等方面的改进措施。

我看后心想，广州军区对这六位将军的优待措施，与我俩湖南之行传达了总政治部的意图是分不开的。因为我俩到长沙后并没有向湖南省军区传达关于六位将军的什么信息，只不过是使用我们的行动表明自己对六位“靠边站”多年的领导同志的政治态度而已。后来听说，湖南省军区干部处处长把我“不一般”的举动向湖南省军区领导汇报后，省军区马上转报了广州军区，于是很快提出对六位将军采取几项优待措施的意见。

#### ◇ 从进京“靠边站”到勒令离京

在我到北京工作之前六位将军就“靠边站”了，所以在我接手的任免干部名单上已经没有了他们的名字，对他们的有关情况，除对秦基伟、李成芳较熟悉外，其他都不甚了了。从湖南回京查阅档案和电话询问昆明军区、南京军区后，才了解到他们的一般情况，他们都是叱咤风云的开国将军。

秦基伟，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靠边站”前为昆明军区司令员。历任排长、连长、团长、军分区司令员、纵队司令员。在朝鲜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中，他是打出军威的志愿军第三兵团第十五军军长。

李成芳，湖北麻城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靠边站”前为昆明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历任班长、排长、指导员、教导员、团政委、旅长、纵队政委、军长。

胡荣贵，山西定襄县人，1933年参加革命，1937年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靠边站”前为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历任干事、队长、指导员、股长、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旅政治部主任、旅政委、省军区及大军区政治部主任。

张子明，山西离石县人，1935年参加革命，1937年参军，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靠边站”前为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历任股长、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副师长、师政委，军事工程学院教育长、副政委。

王蕴瑞，河北巨鹿县人，1931年宁都起义后参加红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靠边站”前为南京军区参谋长。历任参谋、科长、团长、师长、纵队参谋长、兵团参谋长、志愿军参谋长。

张力雄，福建上杭县人，1929年参加革命，1932年参加红军，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靠边站”前为云南省军区第二政委。历任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分区政治部主任、旅政委、纵队政治部主任、军政委。

六位将军都是于1967年初调到北京后“靠边站”的，其中五个人有这样那样名目的专案组进行审查，还有一个人与任何专案都没有瓜葛，也在北京“靠边站”了两年多，他就是秦基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秦基伟回忆录》第十七章“新的考验”中，有一节的题目叫“晾在北京‘靠边站’”，用词十分贴切。他在北京呆的两年多，第一不是停职检查，第二不是等待结论，第三不是等待分配工作，第四更不是被隔离或被监护。那么应该用什么词来表述他的处境呢？秦基伟用了一个“晾”字，我以为完全符合他的实际状况。李德生主任之所以特意要我问秦基伟将军是怎样被留在北京而没有回到昆明的，是因为总政治部事后查问，谁也不知道秦基伟是为什么“靠边站”的，谁也说不清秦基伟“靠边站”后到底归哪里管，实际上是稀里糊涂地“靠边站”了5年多。

事情的起因是，1967年初上海造反派夺权后，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也都跃跃欲试，有的与军内极左的人勾结在一起，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各军区的领导人。周恩来和军委领导为了防止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被揪斗，派飞机将他们接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保护了一段，风声过后其他军区的领导人陆续回到了各单位。昆明军区的两位军政一把手都没有回去，李成芳是因为归专案组管，而秦基伟并无专案，为什么也没有回去呢？所以李德生觉得这个谜需要解开。

在灰汤疗养院个别交谈时，秦基伟讲完他要说的事情后，我问：“秦司令，李主任让我请问你一下，你当时是怎么留在北京而没有回到昆明的？”秦基伟不假思索立即回答说：“是军委××领导同志跟我谈的，他说现在昆明军区机关还比较乱，你先不要回去，呆一段看看形势再说。”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发生后，还是按照军委那位领导同志的要求，秦基伟搬到了海运仓总参第一招待所后小楼，一住就是一年多。《秦基伟回忆录》中有好几处提到，同他一起被疏散到湖南的其他五位同志，都断不了有专案人员光顾，而从来没有专案人员找过他。他当时哪里知道，自己并非专案对象，是糊里糊涂地被“晾”到一边的。

1969年10月17日，林彪利用中央决定战备疏散的时机，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10月18日，总参按照黄永胜的传达，以林彪“第一个号令”的名义通知了各部队。在北京凡是不在职的党政军高级干部，都要立即疏散到外地。京外来的“靠边站”的干部，当然就更不在话下了。

林彪“第一个号令”传达后的一天深夜，突然有几个人到海运仓招待所，找在这里“靠边站”的干部逐一进行个别谈话，宣布军委办事组的决定，要他们第二天就离开北京去外地，并且不得互相打听将要去的地方。这几个人一走，楼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经交谈，得知他们被分到了四面八方。昆明军区的秦基伟、李成芳、胡荣贵、张子明、张力雄和南京军区的王蕴瑞六人分为一个方面，都告知到广州军区。宣布的是命令，非走不可，一点商量的余地也不可能有。大家面面相觑，心情都很沉重，谁也闹不清这次疏散意味着什么，将来命运又将会如何。

第二天火车票准备就绪，六位将军一齐到了北京车站。护送他们的是八三四一部队的一名排长。他按照上面的交代，“忠于职守”，一夜都不敢入睡，对护送的对象进行监督，生怕这些人出了什么问题。

#### ◇ 在潇湘大地的酸甜苦辣

六位将军在谈话中都诉说了这些年来的不正常遭遇，有的提到心酸往事时不禁泪流满面。我们离开疗养院前到病房与六位将军一一告别，他们都表示要说的话都说了，感谢组织派人对他们的看望。我听了六位将军的不正常遭遇，同情之心油然而生，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回到机关如实地向领导作了汇报。

林彪“第一个号令”发布后，当时向六位将军宣布是去广州军区，可是到长沙就让他们下了火车，接到湖南省委招待所住了三天。中间来人向他们介绍了西湖农场的情况，宣布他们将被安排在那里劳动。很快，他们就被送往汉寿县境内的西湖农场。六个人被分到六个连队，规定相互间不准来往。

西湖农场最早是湖南的一个劳改农场，是在洞庭湖西面围湖造田建起来的。房子是犯人们打坯盖的草房，非常简陋；地面坑坑洼洼，用脚一踩就会出水；屋顶上到处是洞，麻雀不断飞进来啄食。夏天炎热难当，冬天冷得要命，洗脸毛巾往铁丝上一搭，转眼间就结了冰。连队伙食极差，几乎整月见不到油荤。

生活条件的艰苦，作为老革命的他们都不在乎，因为他们都是从艰苦环境中走过来的。让他们憋气的是政治待遇，六个人生活上虽然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但在政治上却享受不到一个普通战士的待遇。

他们在西湖农场期间，在连队归班、排、连长管，团里则由政治处的保卫股管。什么矛盾性质的人归保卫部门管理，部队历来都是有明确分工的，所以从管理渠道上不难看出，农场对他们是作为专政对象看待的。由此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精神上的痛苦，他们向我诉说了很多这方面的具体情况。比如：

他们想自费订阅报纸，得不到农场的同意。他们写封家信，寄出前要经保卫股审查，家里来信也要先由保卫股拆阅，凡被认为是不该写的内容一律抹去。每个周末的组织生活，值班排长一吹哨，宣布党员站第一排，团员站第二排，不是党团员的战士站第三排。六位将军都是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但不能站到第一排，第二排也不是他们这个年龄的人应该站的地方，只能站到第三排，跟非党非团的战士们站在一起，听值班班长训话。1970年的一天，以营为单位集合选举四届全国人大的军队代表，秦基伟与全连官兵列队去营部投票。快到营部时，营里一名干部把秦基伟拦住，让他回去看书，剥夺了他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选举权。其他五位同志亦然。秦基伟的女儿畹江住在营部，有位副营长的爱人和畹江比较要好，有一天她很神秘地约畹江到外面一个地方见面，沮丧地告诉畹江说：“今后我不能跟你来往了，组织上已经批评了

我，说我跟你常在一起是立场有问题……”

1972年4月，“九一三”事件发生半年多了，六位将军才接到通知，说要将他们转到湖南宁乡县的一所部队疗养院364医院休息、疗养，从而结束了在农场监督劳动的生活。

六位将军到灰汤疗养院后，吃、住等生活条件比在西湖农场时有了改善，但他们感到在政治上仍然受着歧视：一是活动范围有限制，不得离开疗养院附近；二是每个人配有一名战士，名为警卫，实际是监视他们的行动；三是刚开始看不到任何文件，经一再要求，后来才由省军区政治部每月送一次团级干部阅读的文件集中传看。

这样又过了5个月，政策才渐渐地放宽了一些，而且他们的家人可以到疗养院与他们团聚了，这让他们兴奋不已。六个人都先后经历了到灰汤车站迎接亲人的难忘时刻。秦基伟的爱人唐贤美，于8月初放暑假后带着孩子们从昆明赶到灰汤。这是全家分散五年多后的第一次团聚。

秦基伟说：“随着家人的到来，我的生活也日见规律。每天下午，我扛着竹竿和爱人去四周山坡上打松球，我打她捡，每次提回来一网兜。这固然为了解决生煤炉的引火问题，但更多的是为了充分享受一种田野情趣。上午，我们则读书看报。当时新华书店来卖过几次书，我们买了一些。我的老秘书张维明也从四川给我寄了几本书来。我对他寄来的苏军元帅朱可夫写的《回忆与思考》一书最感兴趣。这本重点记录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作战情况的书，我对照地图读了两遍。因这本书是秘书借来给我看的，我读后又寄还给了他，但内心很舍不得。一次出外散步时，我与同在灰汤疗养的工程兵某师政委谷善庆相遇。我们过去素不相识，但他对我很热情，显得很尊重。当在交谈中我称赞《回忆与思考》这部书不错时，他立即慷慨地说：‘我这儿有一部，我送给你，首长。’在那个岁月里，谷善庆同志能够这样做，是很不简单的，表明了他的不随波逐流和为人的正直，让我非常感动……”

在灰汤，除秦基伟外的其他五位同志，都不时有专案人员前来向他们核实情况，索取证明材料，而秦基伟却如同在西湖农场时一样，仍然没有任何人来找他，所以他有比别人更多的时间享受“田野情趣”。有专案人员光顾的将军，虽然有些想向组织反映的问题可以通过专案组的渠道转达，但有时也会产生“冲突”。张子明将军第二次与我们交谈的内容，主要就是反映专案人员搞“逼供信”的情况。他说，有一个同志的历史情况，按照自己的记忆实事求是地写出证明材料，但专案人员不满意，三番五次地逼迫他按专案人员的口径重写。他坚持不能编造，专案人员就批他的“态度不老实”，双方争吵不休，搞得很不愉快。张子明将军讲到这里，难过地掉下了眼泪。

#### ◇ 结束“牛棚”生活

我和任秘书回到北京的当天，就将我们湖南之行的情况整理成文字材料向李德生主任作了报告。很快他就指示，把我俩向他的报告改一下，改成由他署名向周恩来的报告。

1972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靠边站”被审查的干部要得到解放和分配工作，按当时的惯例都得有个审查结论，有问题要写清楚是什么问题，没有问题也得写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结论。六位将军中的五位都是立了案的被审查对象，要解放分配工作，当然也需要由审查他们的机关提供结论材料。秦基伟没有立案审查，但因为与其他五位将军一直在一起，这次也只好等着一批办理。

五位被立案的将军，只有王蕴瑞归我们第二任免处业务管辖范围——南京军区审查，其余四位的立案单位不属于第二任免处的管辖范畴。因此，领导上就把了解专案组对王蕴瑞审查情

况的任务，交由我们处办理。那时候谁都知道，领导机关向下面了解对被审查干部审查的进展情况，是要求尽快结案的一种催促方法，也就是解放干部分配工作的“前奏”。但是，要了解和搞清楚被审查对象的情况，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如《李德生在动乱岁月》所述：“当时解放干部，在中央政治局，有江青、张春桥的捣乱；在基层，有受极左思潮严重影响的某些干部的干扰，增加了工作的难度。”

王蕴瑞将军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催问了南京军区几次，负责搞他专案的人员都说，王蕴瑞历史上还有一个问题没有查清，所以还不能作结论。什么问题呢？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当时我们第二任免处的工作人员都将此作为笑料来谈论。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的红军组建了闽浙赣军区，方志敏为司令员，粟裕为参谋长。1935年夏，组建浙西南军分区，王蕴瑞（当时叫王永瑞）出任司令员。不久，军分区被国民党军队“围剿”打散，部队大部伤亡，王蕴瑞与上级机关失去了联系，便与浙江籍的一个参谋化装跑到该参谋老家隐蔽起来。国民党的“围剿”越来越残酷，王蕴瑞又不会讲浙江方言，在参谋家里无法长期躲藏。这时参谋的父亲出了个主意，建议王蕴瑞回河北老家去避难，并凑了点路费，与参谋一起将王蕴瑞送到浙赣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火车站，上了开往老家方向的列车。1937年秋，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抗日，王蕴瑞很快与部队取得联系，重新投入了新的战斗。

“文革”中，有人怀疑王蕴瑞从浙西南军分区被打散，到重新回到八路军工作，中间这一段的历史有问题，便立案进行审查。专案组经过调查取证，浙江的那位参谋证明，王蕴瑞上火车前没有被俘、被捕问题，河北巨鹿老家的人证明王蕴瑞回家后，没有任何不正常的情况。但是，专案组以王蕴瑞从浙江火车站到河北巨鹿的中间，尚未取得没问题的证明为由，坚持不能下结论。我们说服专案组的同志，王蕴瑞从浙江上火车到巨鹿的中间，没有人证明他没有问题，但是也没有人证明他有问题呀！单独一个人在长途跋涉中的活动情况能找到证明人吗？你们这样拖到什么时候才算完？最后专案组不好再坚持原来的观点而作罢。

1973年4月，解放六位将军的准备工作终于告一段落，正式决定六位将军离开湖南灰汤，到相应的地方等待分配工作。到什么地方等待呢？经总政治部研究决定，两位大军区正职干部来北京，其余四位，凡是与原单位两派群众无瓜葛的回原单位，否则也来北京待命。4月下旬，干部部以总政治部的名义电话通知了广州军区，请他们责成湖南省军区，派员护送秦基伟、李成芳、王蕴瑞、张力雄四位将军来北京；通知昆明军区，请他们派干部到灰汤将胡荣贵、张子明两位将军接回昆明。

4月28日，秦基伟等四位将军抵达北京，我到火车站把他们接到总参海运仓招待所，仍然安排在他们三四年前住过的后小楼待命。待命期间，分工由总政干部部任免二处负责照顾。4月29日，我将庆祝五一节的游园票一一送给四位将军。5月1日，他们高高兴兴地参加了首都各界的大型游园活动。5月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晨的新闻联播节目和各大报纸，都播出、刊登了新华社的新闻报道。报道中专门有一段说：“参加节日联欢活动的还有：……秦基伟、李成芳、郭林祥、廖汉生、吕东、姚依林、钱信忠、张稼夫、李质忠、童小鹏、邓典桃、李步新等。”

秦基伟、李成芳参加五一庆祝活动的消息公布后，好多人都去招待所看望他们，表示祝贺。一时间，你来我往，好不热闹。他们的这些战友都是“文革”中受过摧残的，大家大难不死，还能相见，都感慨万千。

过了不久，六位将军陆续分配了工作。秦基伟任成都军区司令员，李成芳任国务院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胡荣贵仍任昆明军区副政委，张子明任铁道兵副政委，王蕴瑞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张力雄任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



【文革探讨】

“文革”中后期作家的分化与移位

·肖 敏·

新时期之初相当多的作家，实际上从“文革”时期就已开始了创作，他们在“文革”结束前后创作上的变化，体现了新时期文学矛盾重重的过渡性与复杂性。题目中的“文革”中后期作家，是相对于地下文学作者而言的，特指“文革”中公开发表作品、后来又参与新时期文学建构的作家。本文拟通过对“文革”中后期作家的创作格局的描述，以求把握新时期文学起源的症候特征。

引论：“文革”文学作者群的断裂

“文革”事实上是在文化领域中先行一步的，其标志是一九六六年二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的问世。《纪要》是一个极端的现代主义激进文本，认定要“去创造无愧于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新文艺。这是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1）。尽管说，“文革”期间，当局有意尊崇“三结合”（2）的集体写作方式，但即使是“文革”文学这样极端的文化试验，也并不刻意排斥个人创作队伍的建设。《纪要》的第十条的主题是“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也就是说，官方必须推出代表这种“新文艺”的作品和作者，以从实践的创作领域回应理论上的倡导。

但实际上，鉴于“文革”期间的文学出版的凋敝，要重新组织文艺队伍，仅从物质操作层面都是不可能的。以“文革”期间出版的期刊为例，由于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到“一九六六年底，全国出版的期刊总数，从‘文革’前的一九六五年的七百九十种，骤降到一百九十一一种，后一年又猛降到二十七种，到一九六九年，只剩下《红旗》《新华日报》《中国文学》等二十种，是近百年来中国期刊发展上全国期刊年出版量的最低点”（3）。再以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九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为例，这四年中，全国公开出版的长篇小说仅五部，并且这五部主要是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文革”正式爆发前出版的，一九六七年、一九六八年两年间没有一部长篇小说出版（4）。期刊、报纸以及文学出版物的急剧减少，导致文学作者的数量减少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文革’开始的最初几年里，除极个别作家（郭沫若、浩然，以及一些工农出身的作家，如胡万春、李学鳌、仇学宝等）仍可以发表作品外，作家普遍失去写作资格”（5），一九七二年后，有资格发表作品的专业作家开始增加，但大部分仍不能写作。据著名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前社长韦君宜回忆，当时“哪里还有什么作家来写稿出书呢？有的进秦城监狱了，有的下干校了。要出书，就要靠‘工农兵’。换句话说，靠不写书的人来写书”（6）。相较而言，尽管十七年文艺界在数次运动后已噤若寒蝉，但总体上还有一支稳定的作者队伍，但“文革”文学却呈现出作家系谱的断裂局面。

“文革”中文化生产的单一和凋敝的现状，连毛泽东本人都颇有微词，毛在一九七五年找邓小平谈话时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稍有点差错就要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7）但若要改变现实的文化生产状况，对于晚年的毛泽东来说，已是回天乏力了。

#### ◇ 一体化缝隙中的双重心理——“文革”中后期作家的创作姿态

“九一三事件”后，文艺界出现了某种松动和调整，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原《北京文艺》以《北京新文艺》为名率先复刊，随后，《广西文艺》《广东文艺》《革命文艺》等刊物相继复刊。一九七三年，《上海文艺丛刊》（后改名为《朝霞》文艺丛刊）复刊；一九七四年，《朝霞》月刊创刊。书籍出版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如鲁迅作品的单行本二十四本到一九七三年底全部出齐。

一九七四年前后，多部古典文学得以出版，比如《明容玉堂刻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等。长篇小说的出版数量也有了较大增加。

“文革”中后期，初走上文坛的年轻作者的心态是复杂的。总体来说，当时能被允许发表作品，本身就是一种荣誉。以张抗抗为例，她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她两岁时即被开除出党，张抗抗后去北大荒当知青。一九七四年，正在创作长篇小说《分界线》的张抗抗因病在上海休养，素未谋面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两个编辑带着营养品到病房探望，亲切鼓励她完成创作〔8〕。这对于一个从小在出身不好阴影下长大的青年来说，无疑是知遇之恩，由此产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心理也在常理之中。对于一些有历史问题的中年作家，若有相似境遇，其认同心理更是如此。“文革”后期，在苏北射阳县当农民的陆文夫被“上面”叫去谈话，让他创作斗争走资派的小说，题目都规定了，叫“新潮”，并有意让他担任当地文化馆副馆长。尽管此事因“文革”结束而停止〔9〕，但对于一个饱受歧视的“右派”分子来说，能受到主流文化形态的青睐，无疑是一种政治待遇，内心如有惶恐甚至感激是完全可能的。

但历史情境的复杂之处就在于，作家的实际生存策略并不能阻绝其内心的思考乃至疑问。以韩少功为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他在湖南汨罗县当知青，当时其文学才华就被认可，被选派到县上参与撰写开国元勋任弼时的材料集（任是汨罗人）。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韩少功发表了三部作品，短篇小说《红炉上山》《对台戏》和评论《批判湘剧〈园丁之歌〉：育的是什么样的苗》，这三部作品是相当规范的“文革”文学作品。据韩少功回忆：“我当时就没有足够的勇敢，虽然接触到一些地下的思想圈子和文化圈子，已经对当时的主流话语有了怀疑和反感，但还是抱着谋生第一的私心，屈从于那时的出版检查制度。”〔10〕应该说，韩少功的这种双重心态在“文革”作者中并非仅见。

如王尧指出的，“其实不仅是顾准，而且包括郭小川，还有郭路生，也有用两种话语写作的问题。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真假的问题，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充满矛盾的，如果没有这个矛盾，那么就没有后来的转换。”〔11〕相当多的作家在力争取得“文革”主流话语的认同，这是他们取得生存和写作权利的首要条件，譬如莫应丰，他在一九七四年就开始秘密写作批判“文革”的长篇小说《将军吟》，但这并不妨碍他写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长篇小说《小兵闯大山》（1976年9月出版）。《小兵闯大山》基本上是符合当时文学规范的，但文中传神的人物对话、浓郁的生活气息、生动的地方风物描写，与此前出版的克非的《春潮急》有相似的地方。

类似于韩少功、莫应丰、郭小川和食指的矛盾心态，在“文革”后期作者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洛姆认为，自由对人具有双重意义，它的负面效应就是常常使人限于极端的孤独中，人们只好向后倒退，连消极的自由也放弃掉，“逃避的心理结构是指个人放弃其自己独立自主的倾向……换句话说，也就是寻求新的第二个束缚，以代替其他已失去的原始约束”〔12〕。在当时“触及灵魂”的全民革命氛围中，作家“逃避自由”的心理无疑是非常普遍的，这也是众多作家参与到“文革”主流文学运作的原因之一。“文革”中发表作品、后来参与新时期文学建构的作家人数是相当惊人的，张抗抗、贾平凹、韩少功、陈建功、陈忠实、叶蔚林、古华、刘心武、蒋子龙、郑万隆、王润滋、朱春雨、朱苏进、刘亚洲、张长弓、

周克芹……我们对此完全不必有所隐讳。

#### ◇ 多重写作模板存在的可能性——“文革”中后期作家的分化

可以说,“文革”中后期,主流文学仍然出现了一些细微变化——这些细微变化蕴含着一些重要讯息。一方面,“文革”文学的一统化局面开始出现裂缝,使《纪要》所代表的“文革”激进主义文化思潮面临波动;另一方面,被排斥的一些传统的、西方的审美因素重新回到创作中,使得“文革”后期文学呈现出某种暧昧状态,譬如,《大刀记》《沸腾的群山》《剑》这些“前文革”的长篇小说得以出版,八个样板戏被各地方戏曲移植呈现了不同艺术样貌等。

据现有资料来看,“文革”中后期官方意识形态的控制仍是相当严格的,但已不同于前期那种砸烂一切的激进主义文化策略:报刊图书出版开始恢复,公共图书馆逐步开放,知识分子被允许部分程度地恢复工作等等。“文革”之前和期间内部发行的“灰皮书”和“黄皮书”开始一定程度的流传,地下文学风起云涌,这些都显示“文革”后期多重写作模板存在的可能性。尽管地下文学的发展完全不能取代主流文学的权威地位,其流传程度也有限,但历史的运行终究是一种合力,在“文革”主流文学作家群这里就出现了某些分化。

“文革”地上作家中,有一部分人是“文革”前就开始创作的。古华在“文革”前就有作品发表,他在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四年间有短篇小说《“绿旋风”新传》《春临街纪事》《仰天湖传奇》发表,一九七六年九月出版了长篇小说《山川呼啸》(可视作《仰天湖传奇》的长篇扩写版本)。《仰天湖传奇》在题材上并不具有更多新奇之处,兴修水利这个背景在别的小说也用得很多,但这部小说在“文革”后期主流文学中仍是独特的,小说对仰天湖奇美风光有逼真描写,生动地描写了地下探险、阴河截流等富有传奇意味的场景。

类似古华的“文革”作家还有叶蔚林。叶蔚林与古华一样,“文革”前也有作品问世,其发表于一九七五年的《大草塘》和《狗鱼的故事》,都能在“文革”话语的包围中显示出一定的艺术功力。《狗鱼的故事》写的是盘金旺苦大仇深,孩子因无钱救治而病死,解放后,在党的政策感召下重新捉鱼,探索人工喂养狗鱼的方法,小说中是这样描写的:“盘金旺十岁死了爹娘。青山千叠,没有他的一撮泥土,森林似海,没有他的一片叶子,他像一只倒巢的鹌鹑儿,落到秀水冲……水中的青苔,把他的双脚染成了苍绿;深山的白雪,染白了他的双鬓……”很难想象,这段优美文字出自于“文革”中的作品。

有意思的是,在贾平凹早期作品中,“文革”“小说创作中的煽仇式正反对举叙事话语”(13)居然以相当童趣的艺术面貌出现。《弹弓和南瓜的故事》是一篇儿童小说,写一群小伙伴如何通过被弹弓射进南瓜的石块这一细节发现地主搞破坏的事情;《队委员》则塑造了一个警惕性很高、可爱可敬的农村大娘的形象。针对贾平凹的“文革”作品,有学者认为“贾平凹的童心与童趣也曾经遭受过污染”(14),我不能完全认同这种说法,依据“文革”严苛的文化语境,以儿童小说的形式描写阶级斗争屡见不鲜,“用布莱希特式的隐喻来说,儿童成了突出的舞台,以使典型的历史力量在上面争斗”(15),作家不过借用了这种形式而已。贾平凹的早期小说,擅长从生活中撷取片断加以提炼,这与其新时期小说的写意式风格构成了对应关系。

总体来看,能够顺利过渡到新时期的“文革”作家,往往分为以下几种:一是“文革”期间积累了丰富的乡村经验,并且在新时期将这种乡村经验化为乡土文学的创作资源,如古华、叶蔚林;二是对自己笔下的生活非常熟悉,且有一定的艺术触觉,尽管“文革”期间的作品平平,但能将这种生活素材在新时期转换成创作题材,如陈建功、李存葆、朱苏进;三是“文革”期间就创作有相对质量上乘的作品(公开发表和未公开发表),在新时期能够继续保持敏锐的艺术感受,如贾平凹、蒋子龙、冯骥才等。当然,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分析这些“过渡”作者的情

况，并非是矫饰历史和美化“文革”文学，而是说，新时期文学并非平地而起，不是随着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四人帮”垮台而突然出现在文学史中的。如果将“文革”文学放在文学史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即使新的文学事实逐步确立，完全不同于‘文革’文学时，它们也没有脱离与‘文革’及其文学的血缘关系”（16），这也是我们来考察“文革”文学及其作者结构的重要原因。

#### ◇ 相互纠缠的写作资源和文学记忆——“文革”后期作家的移位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文革”结束前后的中国文坛，会不无惊奇地发现，新时期之初的文学话语，与“文革”话语竟有相似之处，只是，控诉和斗争的对象转换了，但那种激愤的、诉诸血泪的叙述方式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其实，这就是“文革”作家另一种表现状态了，即作家创作的移位，“文革”的写作资源和文学记忆依然顽固地保留在他们的创作中。

主题内容变化、叙述方式不变的尴尬局面更集中地体现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这主要是因为长篇小说的创作时间更长，很多一九七七年甚至一九七八年、一九七九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其主要内容就是在“文革”中完成的。这样，随着“文革”的结束，作家们的写作姿态就不得不发生匆忙的移位。譬如谌容的长篇小说《光明与黑暗》就是此类作品的代表。谌容最初的打算是要写一个长达九卷的鸿篇巨制，一九七六年二月在吕梁山正式动笔。随着“文革”的结束，谌容不得不进行相关的调整，该书得以在一九七八年出版。取名为《光明与黑暗》，意指造反派和走资派所代表的势力，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上也显得力不从心，譬如乔云广，是过去的县长，走资派出身，在小说中以正面形象出现，这明显是作家为配合新形势作出的匆忙修改，小说的情节也较为拖沓，多处有纰漏。

类似的问题，还体现在朱春雨的《大业千秋》，张笑天的《严峻的日子》，叶辛、忻昀的《岩鹰》等长篇小说中。“文革”结束之初的读者们需要更切合自己情感诉求的作品。这样，表达方式更加“短平快”的短篇小说自然成为新时期之初的主要文体。

刘心武于一九七七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它写到两种被“四人帮”毒害的少年，一种是有流氓习气的宋宝琦，一种是“左”得可怕的所谓好学生谢惠敏，在作家这里，显然后者是更严重的灵魂受伤。倘若我们梳理刘心武的前后创作，就会发现，谢惠敏这个形象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刘心武于一九七五年出版了中篇小说《睁大你的眼睛》，小主人公方旗年仅十一岁，已跟老奸巨猾的教唆犯斗争了，思维之缜密、阶级觉悟之高，不似一个少年，他的“左”与谢惠敏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九七五年，刘心武还发表了中篇小说《盖红印章的试卷》，小说中工农兵的实践教育战胜学校书本教育的故事，在“文革”文学中非常普遍。

“文革”结束后，蒋子龙在《人民文学》一九七九年第七期上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塑造了一个改革家形象乔光朴，被认为是改革文学最早的作品。蒋子龙对工业题材的关注是从“文革”时期就开始的。一九七四年，蒋子龙发表了《压力》《春雷》，一九七五年发表了《势如破竹》《前锋》，描写的都是工业生产中的阶级斗争场面。真正为文坛所瞩目的是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发表在《人民文学》1976年第1期上），是在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国民经济初步调整的大形势中产生的，小说描写了一个有魄力的机电局长霍大道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可以说，霍大道正是后来乔光朴的原型。由于《机电局长的一天》中表述的对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赞赏，在而后急剧发展的政治形势中，它被判定是为邓小平翻案的“毒草”。蒋子龙顶不住压力，写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小说《铁锹传》，这部作品被认为是蒋子龙创作中的污点，在一九七八年前后又受到严厉批判（17）。很快，蒋子龙在一九七九年拿出《乔厂长上任记》，才算彻底为这种批判画上了句号。

刘心武的《班主任》和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当时之所以能引起那样迅疾的反响，是因为这两个作家恰逢其时地实现了自身创作的移位，这种移位，正是以他们在“文革”中的创作为基础的。尽管《班主任》与《睁大你的眼睛》在价值论上是南辕北辙的，但就人物塑造而言，方旗实际上就是《班主任》中谢惠敏的另一个版本。在《班主任》中，作家从叙事策略上置换了叙述主体，将从前赞扬的阶级斗争置换成批判的对象，将从前的正面人物重新设定为非正面人物。在此基础上，作家安排一个导师的形象（张俊石老师），能更好地以启蒙语调展开叙事，从读者的阅读接受来说，能以俯视角度完成对“文革”的情感控诉和道德批判。

现在看来，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确实是一部比较粗糙的小说，但当时它却引起文坛内外的强烈反响，这主要是因为读者的审美期待中，需要乔光朴这样的铁腕人物以管理经验介入到国家叙事的过程中。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二十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显著特征是“工业主义”、“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18），但在很多后发现代国家中，这三个因素并不是同时具备的，是先后产生的。以《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的“开拓者家族”小说所隐含的叙事逻辑就是：将阶级斗争的民族国家话语置换成工业文明的现代话语，使之成为叙事主体。这种话语置换，实际上《机电局长的一天》这样的“文革”作品就已经在悄然进行了。

结语

实际上，“文革”话语范式不仅在“文革”期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在“文革”结束后，依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关于新时期众多作者在“文革”期间的创作，研究界则不应该完全回避。这些作者的创作中矛盾重重的过渡，正是文学史发展的一个映照，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特殊时代的畸变文艺形态给作家造成的种种影响。“文革”文学的研究值得再深入下去。

作者简介：肖敏，武汉工业学院人文系教师，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524页。
- （2）“文革”期间的“三结合”，是指“党委领导”、“工农兵业余作者”和“专业编辑人员”合力进行文学创作，被认为是“造就大批无产阶级文艺战士的好方式”（周天：《文艺战线上的一个新生事物——三结合创作》，《朝霞》1975年第12期）。
- （3）方厚枢：《“文革”十年的期刊》，《编辑学刊》，1998年第3期。
- （4）以上数字，根据《全国总书目 1966——1969年》的数据，中国版本图书馆编，1987年出版。
- （5）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85页。
- （6）韦君宜：《思痛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151页。
- （7）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615页。
- （8）张抗抗：《从西子湖到北大荒》，《小说创作与艺术感觉》，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
- （9）《姑苏小巷有文夫》，《文艺报》，1999年10月9日。
- （10）（11）《韩少功、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28页，第30页。
- （12）弗洛姆：《逃避自由》，中国工人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89页。
- （13）吴培显：《当代小说叙事话语范式初探》，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153页。
- （14）王尧：《迟到的批判》，大象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8页。
- （15）[英]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9年出版，第30页。

〔16〕许志英、邹恬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下册，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2004年出版，第684页。

〔17〕蒋子龙写作《铁锹传》前后的风波，在吴俊《环绕文学的政治博弈》（载于《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6期）和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中有详细记载。

〔18〕〔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和方文译，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第16页。

□ 《名作欣赏》（学术专刊） 2007年第8期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